

丘石中医系列

医医

告别中医西化

李致重◎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R2-031
45

● 丘石中医系列

医医

告别中医西化

李致重◎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学院

062390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医医：告别中医西化/李致重著. —太原：山西

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8

ISBN 978 - 7 - 5377 - 4216 - 0

I. ①医… II. ①李… III. ①中西医结合—研究 IV. ①R2 - 0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0173 号

医医——告别中医西化

著 者 李致重

出 版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太原建设南路 21 号 邮编：030012)

发 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电话：0351—4922121)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351 - 4922063 (编辑部)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10

字 数 158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77 - 4216 - 0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中医百年的睿智总结

鸦片战争以降，西学东渐，中华文化一直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的民族曾不断做着“慌乱盲目的文化抉择”，甚至长时间容忍以“最崇高”的名义对文化实行摧残。今年，辛亥革命已历百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年过九旬，真是应当对我们民族百年来的文化历程做一番认真的反省了。

正当此时，李致重先生以中华文化之命运为大背景，深刻总结中医之路的新著《医医——告别中医西化》即将付梓。这是一本以睿智、仁爱、忠勇之心，犀利痛陈以往并正确指向未来的大作。

本书指出，民国时代走日本人“灭汉兴洋”的老路，鼓噪“废止中医”，是一场没有成行的悲剧；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长期强制推行的“中西医结合”，则是以“结合”为名，行“中医西化”之实，使中医在“发掘”中肢解，在“提高”中湮灭，已经造成空前的损害。作者认为，唯一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依遵1982年宪法，中西医共存、并重，按各自的规律发展；在临床上“中西医配合”，二者相互

补充、合作。本书言简意赅，情深理明，读后让我止不住心跳，感到沉重而又振奋，畅快淋漓而又任重道远。

中医是中华文化的结晶，是中华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有着灿烂的历史，近20年来正快速走向世界，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所喜爱。可是，中医在她的故乡却不能不令人担忧，因为“中医西化”这条决然走不通的“不归路”，始终难以叫停。

原因何在？

从本质上说，各种形式的“中医西化”，不过是20世纪初开始的丧失文化主体，陷入文化自卑、自虐、自残的继续。其力量之所以如此之大，其延续的时间之所以如此之久，原因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一是“行政决定科学”，缺少学术自由；二是“近代科学主义”肆虐，形成“非典型性文化专制”，甚至“自愿从属”；三是“近代哲学贫困”，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包括中医，做不出本原理论的说明。

为了扭转“中医西化”和文化精神溃败之势，致重先生在书中果断提出：直到当前，摆在我们面前最紧迫的学术任务仍然是两条：第一是中医学的正本清源，第二是中医学的科学定位。正本清源要从强化经典教育开始，科学定位应从中西医比较入手。我完全赞成这一主张。

事实上，这两件事相互为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要科学定位，就须正本清源，明了起点和根本特色；而正本清源也正是为了科学定位，对根本特色给出一个现代的说明，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划清与西医的根本分界。唯有把这两件事做好，才能回答中医“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的问题，才能明确知道，中医应当登哪一个舞台，应当跳什么样的舞。

那么，怎样才能顺利做好这两件事呢？我想关键在努力摆脱“哲学的贫困”，突破某些旧观念的局限。应充分认识到，不仅文化是多元的，科学也是多元的，中国与西方在文化和科学上，是对称互补却不

可通约的两个源、两个流。

我们知道，在西方学术中，发生影响的哲学，不仅有唯物论，同时还有唯心论，还有基督教哲学和其他多种多样且不断自由翻新的哲学理念。这就使得他们的理论和科学思维容易多元发展，少受拘束。

至于中华文化和中医学，其本原思维和理论基础与整个西方的主流相比，则根本不同。这个不同，我们必须本着思想解放、学术自由的精神，在认真研读中华经典中，在中西文化与科学的求实比较中去揭示，去把握。在这里，在一切学术领域，要想获得真正的成功，既不可以“行政决定科学”，也不可以有任何“典型性”或“非典型性文化专制”。

医学的目的最终是要通过临床恢复和提高人的健康，一定要落实到实际应用和临床操作上去。这一点没有任何疑问。但是，光看到这一点是不行的。一千四百年前的孙思邈已经告诫我们，不学“易”，无以成大医。“易”，就是中国的哲学，就是中医的本原思维。孙思邈作为一位无与伦比的中医临床医生深切体会到，缺少哲学理论修养是难于成就大医的。他那个时代，没有强大西医学的挑战，没有“中医西化”的干扰，即使在那时，做一名优秀的中医还必须学习哲学，那么，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今天，要想做好一名名副其实的中医，要想守住中医的本位并正确发展中医，就更需要哲学的参与。当今中医的困惑，甚至个别人继续高喊百年前“废止中医”的主张，从学术上讲，其实都源于哲学的贫困和哲学的误导。

我十分钦敬的致重先生，正是一位专攻中医，同时又精心钻研西医和中西哲学的学者。在过去的若干年里，他高屋建瓴，以深沉的思考，为我们写出了一系列颇具启发性的关于中医学方法和发展中医战略的论文与专著。他的著作，尤其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医医——告别中医西化》，我希望所有关心中医和关心中国文化的朋友都读一读。因为中医的命运连着中国文化的命运，而中国文化的命运又决定

着中医的命运。本书作者以充足的理由呼吁，要“告别中医西化”；同样，我认为，以西学或诞生于西方的任何一种学说来“通约”东方中华文化，都是走不通的。我们的一项重要使命，正是要说明中华文化，包括伟大的中医学所特有的理论和对人类不可缺少的特有文化价值。致重先生断言：中国注定还有一场对文化启蒙的新启蒙，这就是关于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化精神的启蒙。诚然如是，而这也意味着人类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医医——告别中医西化》这部著作，就在这一启蒙之列。

刘长林

2011年2月6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中国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民族危机，也面临着艰难的文化整合与重构。而今，一个半世纪过去了，经验固然很多，但是教训也确实不少。尤其在文化整合与重构上，就有许多值得我们反思与研究的问题。比如：慌乱中盲目、被动的文化抉择，近代民族文化自卑症，对传统文化的自虐、自残与灭祖冲动，实用主义驱使下的近代文化、科学的西化等。这一切，不仅动摇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而且加剧了中国近代文化精神的溃败。而文化精神溃败，传统根基不固，文化的整合与重构，便失去了起码的基础。直到今天，这些问题仍然横在我们面前，需要认真思考，努力研究。

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传统文化根基的动摇与文化精神的溃败，也使中医长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废除中医，是近百年来中医遇到的最大危机。1912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漏列中医”事件背后，真正的用意是要“废去中医，不用中药”。1929 年余云岫等人“废止中医案”的用意，是要首先废去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基础科学体系。之后，改造或西化中医，则是半个多世纪里中医遇到的又一重大危机。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改造，是用西医的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知识，重新教育执业中医，以取代或淡化其头脑中原有的中医理论与临床基础知识。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展的中西医结合运动，是在中西医结合的名义之下，将中医逼入西化的陷阱。经过改造或西化之后，中医基础科学体系及其指导下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逐渐被西医的观念和方法肢解、扭曲、取代。中医便逐渐蜕变为丢掉灵魂、失去生命的躯壳——重新倒退回《黄帝内经》之前经验疗法的

禀白。这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改造中医、西化中医的实质与结果。所以，废除、改造、西化，其实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所推行的“天汉兴洋”模式在中国当代的重演。事实已经表明，日本汉方医学的昨天，就是中国中医的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直接见证了这一中国式的“天汉兴洋”的全过程。

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思考与研究中医西化的问题，在此期间的思考与研究，大体可以用“两次聚焦”来概括。所谓聚焦，

就是锁定思考、研究的方向和目标。第一次聚焦大体在1982—1995年间。着重从中医与西医各自的基础理论科学体系这一层面上，做比较研究。1995年，以《论中医学的定义》和《中西医结合定义的研究》两篇论文为代表，对于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概念（范畴）体系的本质属性与特点，事实上已经界定清楚了。第二次聚焦，大体从1996年开始。那时思考与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东西方科学史和哲学史的学习与比较上。以期通过文化整体层次的学习与比较，从历史、文化的背景上，从方法论、认识论的源头上，进一步把握中西医产生的必然性及其本质。当学习与比较逐渐上溯到东西方哲学的源头时，令人兴奋地发现，长期困扰我们的中西医相互关系的问题，却原来是科学和哲学源头上的一些公理化、常识性的问题——既不需要证明，也不容你怀疑。2009年发表的《中医学的科学定位——科学、哲学、人、中医、名实》一文，应该是第二次聚焦的总结。

从本书第四章所提到的有关中西医相互关系的十条公理化原则来看，废除、改造、西化中医，违背了人类科学、哲学的公理与常识。用西医的观念和方法来验证、解释、改造中医的做法，是不可能、行不通、不可取的。过去有人说，不应该执著于“中医西化不归路”。今天我们应该说，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我们将无法估计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洒在了“不可能被西化的中医西化不归路”上。所以在不可能、行不通、不可取的结论面前，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形形色色西化

中医的做法，应当彻底休矣；尽快告别中医西化，将中医从根救起，是我们当今唯一正确的选择。所以，中医复兴的时候，才是成功体现中国“中西医并重”，“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决策的时候；才是全面启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中西医两种主流医学新格局的时候；也才是努力实现两种主流医学临床配合，优势互补，惠及民众，誉满全球的时候。

本书的第一、二两章，主要从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历史背景，讨论了传统文化的自虐与中医的自残，讨论了模仿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灭汉兴洋”的思维模式，在中国废止、改造、西化中医的过程。第三至五章，首先讨论了文化精神溃败下中西医结合运动的混乱、盲目及其教训；之后讨论了告别中医西化的若干公理化原则；最后讨论了以中西医两种主流医学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体制的新格局。第六、七两章，则从两种主流医学的新格局出发，讨论了中西医临床有机配合、优势互补的含义、原则、构想、实践体会等。最后在第八章里，谈了一些当代中医的自医，将中医从根救起的思路与愿望。其后的附录里，选了几篇相关的中医科学学、软科学研究的论文、资料，以便于读者前后对照参阅。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李俊文、恩师柴浩然；献给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一、二、三届理事会的理事们！在本书行将出版之际，谨向始终不渝地关心、帮助、鼓励、爱护我的长辈、老师、朋友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感谢我的家人，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理解、支持和默默奉献。感谢北京和香港的青年中医们，感谢为本书的出版提供帮助的于红、李宇铭、李凯平、李笑宇、王明浩、刘微英、徐丽丽、林振邦、郑浩迪、陈海勇、蔡杰天等。

李致重

2012年3月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传统文化自虐和自残中医的背景	1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
二、民族文化自卑症	5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	10
四、国学名流贬中医	18
第二章 从“灭汉兴洋”到中医西化	23
一、困扰中医百年的非典型性文化专制	23
二、漏列、废止、改造、结合及其实质	27
三、几点补充说明	32
第三章 文化精神溃败与中西医结合	35
一、文化精神与文化精神溃败	35
二、没有起跑线的中西医结合	36
三、一个命题十种口号	38
四、十种口号有悖常理	40
第四章 依据中医原理论告别中医西化	46
一、中西医比较的核心、目标与要素	46
二、两次聚焦与公理化原则	47
三、中医学原理的十条公理化原则	49
四、彻底告别中医西化	56

第五章 从中西医并重到中西医配合	58
一、中西医并重的公理性及其核心	58
二、中西医并重的逻辑证明	59
三、终止结合才能走向中西医配合	60
第六章 配合的含义、原则与学术现状	65
一、中西医配合的含义与原则	65
二、正视三连环的学术现状	70
第七章 有机配合的实践、构想与体会	73
一、中西医配合的实践与体会	73
二、中西医配合的初步构想	74
三、患者等待有机配合	76
第八章 将中医从根救起	80
附录一 中医学的科学定位	83
一、“科学”的来历与含义及其一般性分类	84
二、“哲学”的来历、含义需要厘清	87
三、医学面对的“人”和中西医研究对象	92
四、在中西医比较中厘正中医的科学定位	94
五、名实颠倒的考据积习对中医危害甚深	96
附录二 中医要发展必须过三关	102
一、制约中医学术复兴的三大难关	103
二、以中医的科学定位为突破口	108
三、结束语	111
附录三 依据中医的科学特点立法	112
一、在立法的根本出发点上，不应出现自相矛盾的提法	112

二、中医药学的特色和优势，是中医立法的根本科学依据	113
三、要彻底澄清模糊口号背后的“潜台词”	117
四、“中西医结合”的提法不科学	119
五、应当突出国家在中药材道地化生产中的主导作用	120
六、应当以统一的学术标准，界定“医师”	121
七、关于本法的结构及表述问题	121
八、关于“名词、术语的解释”问题	122
九、最后的意见与建议	123

附录四 生于忧患	125
----------------	-----

第一章 传统文化自虐和自残中医的背景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科学，一直笼罩在持续的自卑与自疑的阴影里，因而造成了空前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思想的失神。中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种文化背景中，自虐、自残冲动和灭祖冲动也自然笼罩着中医。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今天，是应当对我们民族一百年来的文化历程，做一番认真反省的时候了。为此，这里讨论中医学术的兴衰与存废，首先要从中医所在的文化背景谈起。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李鸿章（1823—1901）先生把他所在的内外交困的时代特点，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应当说，李鸿章所讲的大变局，主要是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现实社会角度而言的。我们认为，鸦片战争真正的大变局首先是人心——在人的文化心理上，其次才是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所谓人的文化心理，主要是指那些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方面占有一定知识资源，又手握大大小小的权力，或者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那些读书人的心理取向。这种心理取向，也就是文化精神。

1. 内外交困时代的亡国灭种危机

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体制里，曾经发生过多多次专制王朝的权力更替。不过这种更替，基本上是在中华民族特定的范围内进行的。自秦至清，中国社会始终是老瓶装陈酒——专制王朝的体制，两千年来大体上没有改变。虽然常常有一些内部争斗或者局部的战争，也常常有一些天灾饥荒或者瘟疫流行，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多数人还是会在固有的体制内，在固有的文化习惯中，得到一定的安适与和谐的。至少在多数情况下的多数人，不会为“亡国灭

种”而担忧。

然而，中国清代末年则完全不同。当王朝内部溃败，面临改朝换代的时候，正是欧美诸国日益富强、急剧膨胀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从海上远道而来的八国列强，以其船坚炮利闯进中国大门，群起而瓜分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的时候，朝野上下的读书人，无不为之忧心如焚。相继发生的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甲午海战、多项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八国联军进北京等，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一次又一次深深地刺上了“亡国灭种”的伤痕。这些痛苦，至今让中国人不能忘怀。可以说，鸦片战争从此使中国人失去了传统文化孕育下的安适与和谐。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中，既怨恨政府腐败无能，又怨恨列强横行无理，形成了流行于近代举国上下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

2. 千年文化强国里的文化心理重负

过去的三千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人所共知的文明强国、大国。对于强和大，社会上有许多不同的版本或理解。如果从文化的整体高度上看，中国的强和大，大体有三方面。

其一是精神文化，这是文化的主体。以儒、释、道为代表的精神、思想、价值观哲学是其核心。在此基础上，包括习俗、传统在内的风格独具、内容丰富的各种文化现象，都属于这一范畴。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文化主体精神孕育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群体，占了全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其二是物质文化，这是建立在文化主体基础上的物质文明。这里仅就经济而言，自汉代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持续雄居世界第一，长达一千六七百年之久。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GDP仍然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左右。

其三是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影响力。这里仅就幅员广大而言，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五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的中心，不曾改变过。从历史上看，尽管中国的版图有大有小，有增有减，但总体上还是增多减少。以江、河流域为中心，包括珠江、淮河、松花江流域在内的，以中国文化紧紧地凝聚在一起的多民族的大家庭，始终是中华民族引以骄傲的。随着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传播，以中国文化特有的包容性和影响力，越来越为世界更多的人所注目。

从以上三方面看，中国五千年的强与大，主要的基础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

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和影响力。所以，根本的功劳不在帝王，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于这一点，我们千万不可忽视。我们在这里还要指出，封建的王权文化、专制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化，它是为封建专制制度服务的，是违背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糟粕。因此，决不能把王权文化、专制文化，混同为广大人民创造的文化，更不能把这些糟粕归咎于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及其精神、思想、价值观念。社会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其实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同样不能脱离文化主体的支配。比如元太祖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帝国，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了中国；清兵入关建立了清家王朝，满族后来同化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这其中的合一与同化，正是中华文化主体精神的包容性和影响力所致。所以，简单地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视为一个国家强大的根本，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

正是因为三千年来中国的强和大，近一百多年来中国朝野上下为此在心理上的负担极其深重。多数懂历史、有理性的人，都害怕做有负于三千年文明大国的罪人。这种深层的心理重负，与文化根基不深不厚的弱小国家相比，心理上的感受完全相同。后者也许在短期的无可奈何之后，很快会以自慰抚平民族的伤痛，但三千年雄居世界之首的中华民族，不会那样简单。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些事实，软弱无能、奴颜婢膝的清家王朝成员们不会忘记，那是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最大的耻辱；有血有肉的每一位中国人也不会忘记，那是刻在中华儿女心头抹不掉的伤痕。八国联军后来尝到了中国是一块吞不下的肥肉，但是日本人不学无术，而且疯狂地发动了侵华战争。这场抗日战争即使由八年延长到十六年，中华民族早晚也会把侵略者彻底驱逐出境的。这就是中华文化主体精神，一个千年文化强国在后人基因里留下的力量。其实，这也是三千年历史的积淀在每一位中国人心理上的自然反映——为失去强大而求强、自信，为失去强大而悲愤、自卑，都是这种历史积淀的心理反应。自信与自卑，原本是一对孪生兄弟，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而且自信与自卑越是受到压抑，就越是变得过度强烈。一百多年里，中国人的过度自信与过度自卑，往往表现得失去理智，甚至两极分化，病态百出。这其实不是中国人天性里的基因出了问题，一方面因为内忧外患的形势太复杂、太离奇，另一方面因为慌乱中的文化抉择太偏激、太混乱。所以，过度自信与过度自卑这种两极分裂的文化心理，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抉择中的两种典型的病态。往往在同一个人身上，也时而过度自信，时而过度自

卑。讲“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李鸿章，提出“以夷制夷”主张的是他，签署多款丧权辱国条约的也是他。这一点是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文化的时候，不可忽视的。

3. 慌乱盲目的文化抉择

近代中国的文化抉择，是整个国家的大事。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抉择，亦即东西方文化的整合与重构。面对亡国灭种的大危机，如果手握着大大小小的权力或者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那些读书人，能够站在中华文化主体精神的高度上，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然后选择出恰当的、具体的技术性战略，也许形势与效果会好得多。现在讲这些，当然是一种过时的假设或者想象罢了。因为一百多年里中国的文化抉择，有许多都是在慌乱中、被动的应付中，两极分裂的争论与内斗中做出的。

这种慌乱中的被动应付，在清代专制王朝倒台前，表现得更为普遍：面对西方强手，我们奋起反抗；面对大败的痛苦，我们想到图强；面对船坚炮利，我们师夷长技；面对西方以民意治国，我们实行变法；面对西方观念新、民智高，我们反孔、反传统，革新文化、丢掉自己；见到形势稍有转机，我们便派系林立、主义无穷，相互争斗、内乱不已……我们总是跟在别人的后边，政治家讲政权，军事家讲打仗，知识精英讲主义；或者由着自己的性子，各自为政，自以为是地急于应对。我们很少以正视历史、现实的态度，从三千年中华文化的主体精神出发，自觉地、及时地、民主地、严肃地、全局性地、战略性地研究和思考我们所面临的东西方文化整合、重构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文化人应负主要责任。

清代专制王朝倒台之后，对于中华文化主体精神基础上的东西方文化的整合、重构，我们一直缺乏足够的重视。比如，从现实社会的角度上看，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农业等诸多方面应当如何适应呢？又如，从精神文明的角度上看，中国在文化、思想、价值观、哲学等方面应当如何调整呢？再如，始于20世纪前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争论，为什么还没有搞清楚何为“中学”，何为“西学”，便各执一词而又马马虎虎地收场了呢？还有，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科玄论战”，曾一度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为什么参与者双方不首先把什么是“玄学”，什么是“科学”这两个概念弄明白，因而使这场事关近代东西方文化整合、重构